

人口素质红利时代的中国服务业增长

□张月友 □董启昌 □方瑾 □宗文

本文从微观视角考察人口素质差异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以中国为背景的研究显示,2011年为中国服务业加速增长的时间拐点,且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高素质人口在中国服务业加速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人口素质对于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机制可以分解为高素质人口的“比较优势效应”、“机会成本效应”、“心理偏好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四种。本文为划分中国所处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经济进入“刘易斯拐点”后,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由服务业大国迈向服务业强国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 人口素质; 技能溢价; 经济服务化

中图分类号: F1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20)03—0056—10

引言

不论是按国际标准还是中国标准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下降,人口总抚养比连续上升,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刘易斯拐点”^{[1]19}。根据鲍莫尔^[2]服务业增长方程和中国服务业发展仍处于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第一波发展阶段特征^{[3]92},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一个推论是,中国服务业发展速度可能受制于劳动力要素供给不足^{[4]110}。实际情况则不然,按当年价格计算,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2011年的44.30%递增至2018年的52.20%,远超第二产业11.5个百分点,服务业已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①。也即,十二五以来的中国服务业增长不仅没有受所谓的劳动力“天花板效应”制约,反而跑出了加速度。

为何中国服务业能跑出加速度?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服务业增长源于服务业价格以更快速度上升^{[5]25}和统计技术进步^{[6]77②};一些学者将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存在“鲍莫尔成本病”^{[7]109};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资源要素从传统的具有产能过剩的工业中释放出来,为增加服务业供给提供了充足劳动力、资金和技术^[8]。与上述观点不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已有赶超工业的态势^[9],现代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正改变服务业基本性质,服务业生产率低的传统假设已不再成立,中国服务业“加速跑”更多地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转变和机制设计研究”(15BJY023);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创新全球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7WTA0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媒体关注、投资者反应与企业危机负面溢出效应”(71702068)

作者简介: 张月友,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董启昌,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机构业务部经理; 方瑾(通讯作者),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助理; 宗文,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①《中国统计年鉴2019》。

②中国2004年、2009年和2014年三次经济普查分别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升了8.8、1.7和0.8个百分点。

源自其自身增长^[10]。对服务业加速增长成因的众多研究文献为认识中国服务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但是,中国近年来的服务业增长总体上是真实增长,一个有力的判断依据是,中国经济服务化过程中服务业与非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偏差趋于收敛^[11],同时中国服务业的加速增长使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演变。从三次经济普查对服务业增加值修订的幅度越来越小看,统计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增长的数据影响已经弱化。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结构调整功能始于“十三五”,无法解释2016年以前的中国服务业增长。随着现代通讯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广泛使用,有关服务业生产率的关键假说虽已不再成立,但距离判断中国的服务业成本病已被生产技术创新所治愈为时尚早。可见,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成因还需要其他解释。

2011年前后,与服务业加速增长相伴,中国逐渐从人口数量红利时代转向人口素质红利时代。那么,服务业增长和人口素质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能否从高素质人口与低素质人口的微观经济行为差异出发,解释中国服务业加速增长?进一步地,能否根据影响机制不同,把人口素质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进一步细分?另外,人口素质除了自身会直接影响服务业增长之外,收入水平、技术进步等其它外在力量是否会以人口素质为传导媒介对服务业增长发挥作用?

从微观视角论证两部门经济中人口素质差异对于服务业加速增长的影响。本文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加速增长,正是与中国高素质人口数量及其技能溢价的迅速上升同时发生,而且三者的增长趋势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不同素质的人口在消费和生产方面会有不同的行为差异,这种行为差异将最终影响产业结构的变迁,而这无疑对服务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可能的新意有四:第一,首次考察并确认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为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划分奠定理论基础;第二,对服务业增长成因的研究没有建立在服务业生产率低这一传统服务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之上,从而引领了服务经济研究前沿;第三,采用供需结合分析方法,既从供给角度引入高素质人口与低素质人口的生产率差异,又从需求角度引入高素质人口与低素质人口的消费结构差异,为理解服务业增长动因提供了一种更深层次的解释;第四,焦点集中于服务消费与产出,而不是原始劳动力配置,这与早期服务经济经典文献也有所不同。这种关注服务产出和消费体验而非生产投入的做法,体现了服务业产出和消费不同于农业和制造业的思想,符合中国处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换和急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

一、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

(一)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统计表现

首先,进入新世纪,以当年价格计算,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从2011年开始呈现加速上升态势。如图1所示,中国服务业发展分为2001—2007年、2008—2010年、2011年至今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到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式工业化是以发达国家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展和制造业生产的非一体化为背景,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发展低端制造业,推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因为制造业全球化的同时,服务业是本地化的,二三产业间本该有的内生性良性互动关系被人为割裂了,因此中国式工业化模式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12]98[13]46}。在统计图表上,很容易发现,以现值衡量的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2001—2007年间呈现出近似水平的极为缓慢的增长走势。在第二个阶段,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对工业实行了强刺激政策,实质上依然奉行粗放式工业化发展战略。这段时期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统计上呈现出微弱的上升态势。在第三个阶段,伴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科技水平进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亮点纷呈,服务业呈现“加速”增长。

其次,2012年左右,以不变价格衡量的中国服务业比重也跑出了“加速度”。鉴于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率指的是实际增长率,是按不变价格或可比价格衡量的真实增长。因此,按可比价衡量,中国的经济服务化趋势并不一定与其名义增长趋势相同。下图2反映的是以2010年不变价衡量的中国服务业比重变化情况。从图2可以看到,2010年之前,以不变价格衡量的中国服务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但整体变动很小;但在2012年左右,与以当年价格衡量的中国服务业比重的走势相同,以不变价格衡量的中国服务业比重也呈现出了“加速”上升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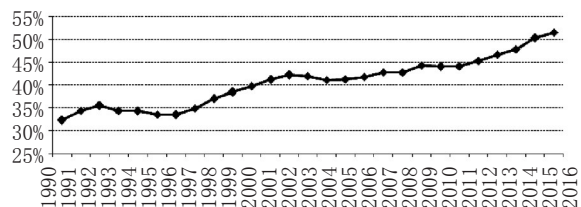


图1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按当年价格计算)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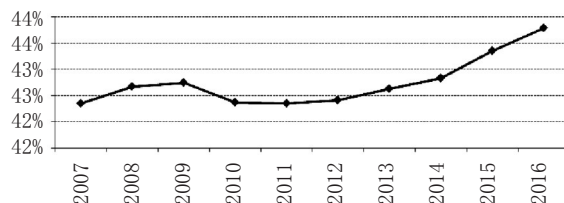


图2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2000年不变价)②

综上,根据服务业名义比重变化,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大概在2010年或2011年左右。而根据服务业不变价比重变化,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大概在2011年或2012年左右。也即,结合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名义和实际两方面的统计变化,只能知道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大约落在2010—2012年之间,具体在哪一年,无法确定。

(二)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确认

为了确定中国服务业加速发展的具体“时间拐点”,基于中国200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尝试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判定。具体模型如下:

$$s_{i,t} = \alpha_i + \beta \ln y_{i,t} + e_{i,t} \quad (1)$$

模型(1)中, s 表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y_{i,t}$ 为省份*i*在*t*年的人均收入, α_i 是省份*i*的固定效应, β 反映了人均收入水平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变化的影响程度。根据 β 的显著性及其大小来判断中国服务业开始加速发展时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而确定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这一门槛值时的年份,这一年份即为中国服务业的“加速拐点”。

根据前文,中国服务业跑出加速度的时间拐点大约落在2010—2012年之间。基于以下四点,选择以2011年试错:(1)中国经济明显减速的时间是2011年。(2)不论是按国际标准还是中国标准计,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人口总抚养比上升为典型特征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发生在2011年。(3)服务业成为我国就业第一部门,首次超过农业的时间也是发生在2011年。在这一年,服务业就业比重比第二产业多6.2个百分点,比第一产业多0.9个百分点。此后,服务业就业比重一骑绝尘,到2016年,服务业就业比重比第二产业多14.7个百分点,比第一产业多15.8个百分点。(4)代表中国市场和偏好风向标的外资投向出现拐点的时间点也是2011年。同样在2011年,在利用外资上,我国工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是557亿美元,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约583亿美元,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随后,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越来越高,而工业利用外资占比匀速下降。

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36403元。以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是否达到36403元为依据,将中国除台湾、香港和澳门之外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样本数据划分为高收入样本和低收入样本,分别根据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高收入样本组和低收入样本组中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S*和人均收入*y*描述性统计结果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

②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3-3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计算。

见表1的上半部分。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显示了高收入样本组和低收入样本组对于模型(1)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高收入样本的回归结果中, β 的大小为0.129,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对于中国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达到36403元的高收入样本,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每上升1%将使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0.0013;低收入样本的回归结果中, β 的大小为-0.007,仅在10%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对于中国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低于36403元的低收入样本,地区居民人均收入的上升还会使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出现轻微下降,但二者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此外,还根据2011年这个时间点为标准对样本进行划分。2011年之前的样本组和2011年及其之后的样本组中,服务业增加比重S和人均收入y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的下半部分。表2的模型3和模型4分别显示了2011年及其之后的样本组和2011年之前的样本组对于模型(1)的回归结果。在2011年及其以后的样本的回归结果中, β 的大小为0.171,且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每上升1%将使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0.0017;而在2011年之前的样本的回归结果中, β 的大小为-0.016,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2011年之前地区居民人均收入的上升还会使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微弱下降。

可见,无论是使用人均收入标准,还是使用时间点标准,计量实证结果均指向2011年为中国服务业加速增长的时间拐点。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低收入样本组					
	样本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	312	0.4	0.058	0.283	0.691
y	312	19000	9322	3257	36000
高收入样本组					
	样本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	153	0.471	0.108	0.347	0.802
y	153	57000	20000	37000	120000
2011年之前的样本组					
	样本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	186	0.442	0.093	0.297	0.802
y	186	48000	22000	16000	120000
2011年及其之后的样本组					
	样本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	310	0.41	0.078	0.283	0.761
y	310	22000	16000	3257	85000

注:根据stata14计算。

表2 中国服务业加速增长的“时间拐点”测算

	模型1-高收入样本	模型2-低收入样本	模型3-2011年及其之后的样本	模型4-2011年之前的样本
	s	s	s	s
lny	0.1291*** [15.23]	-0.0065** [-2.24]	0.1706*** [11.10]	-0.0158*** [-5.33]
_cons	-0.9370*** [-10.14]	0.4632*** [16.40]	-1.3824*** [-8.41]	0.5639*** [19.61]
N	153	312	186	279

注:[]中为估计系数的t值,*、**、***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5%和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

二、人口素质提升与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统计相关性

(一)高素质人口比重与服务业增长在统计上的相关性

人口素质高低是一个相对概念,为准确起见,分别以中国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和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水平。图3揭示了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高素质人口比重在相同时间段内的增长趋势。从中可以发现,在2004—2016年的12年间,无论是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还是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均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在增长趋势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特别地,考虑到人口素质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时滞(假定为一年以内),这种一致性将更

加明显。如图3,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2015—2016年呈加速上升趋势,而该年度的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却呈温和上涨态势,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甚至有微弱的下降,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如果考虑时滞因素,2015—2016年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变化趋势应与2014—2015年的高素质人口比重变化趋势相对应,从图中可以发现二者正好是一致的——均在加速上升。同样,中国高素质人口在2015—2016年温和上涨,也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2016—2017年的渐进上升相一致。因此,整体上中国高素质人口比重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2011—2016年之间的增长趋势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均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

(二)技能溢价水平与服务业增长在统计上的相关性

与中国高素质人口快速增加同时发生的,还有技能溢价的不断上涨。姜雪^[14]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简称CHNS)的微观数据,对中国1989—2011年的技能溢价水平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在1989—2011年这整整22年时间里,除了2009年之外,其余年份中国的技能溢价水平始终呈现不断上升态势。由于CHNS只涵盖1989—2011年的数据,而中国的统计资料又缺少按教育程度划分的平均工资数据,使得2012年及其之后的中国技能溢价水平目前还缺少可靠的数据来源。考虑数据可得性,借鉴宋冬林等^[15]和陆雪琴和文雁兵^[16]的方法,以高素质劳动力比重较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与高素质劳动力比重较低的“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值作为技能溢价代理变量,来衡量2011年之后中国技能溢价水平变化情况。见图4。从图中不难发现,2011—2016年中国技能溢价水平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同时呈现出加速增长趋势,且增长趋势变动也几乎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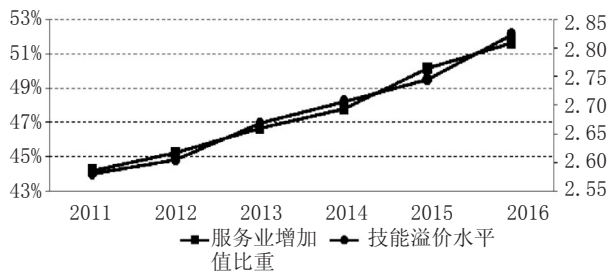


图4 技能溢价水平与中国服务业比重的统计相关性^②

(三)人口素质对服务业增长的直接影响

总体来讲,人口素质对服务业增长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素质人口在生产效率的比较优势、自给自足的机会成本和对服务产品的心理偏好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使不同素质人口的物质产品与服务产品的生产消费抉择具有行为差异,从而影响实际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另

①数据来源:2005—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 通过生产率方面的比较优势效应对实际服务业比重产生影响。与低素质人口相比,高素质人口的比较优势有二:一是,对于较复杂的产品,高素质人口具有生产效率上的比较优势,而且随着服务复杂度的提升,这种比较优势更加明显^①;二是,当服务复杂度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低素质人口受自身水平限制而难以生产,高素质人口在服务生产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将趋于无穷大。相应的,这种生产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对实际服务业比重的影响也有二:一是家庭服务愈加市场化^[17];二是服务消费范围得以扩展。

高素质人口专业化分工促进家庭服务市场化。从供给端,人们能生产的服务产品通常不只一种,但生产不同复杂度的服务产品熟练程度不同,出于经济性考虑,人们会选择在市场中生产熟练程度相对较高的一种服务产品,而在家庭中生产熟练程度相对较低的其它服务产品。而从需求端,出于低成本考虑,对于自己能够生产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较为复杂的服务,经济个体常常选择从市场购买,因为市场中有比他们素质更高的人口在生产同样的服务,而且更高的生产效率使这些高素质人口能够以更低的生产成本来提供同质服务。

高素质人口保障高端服务供给能力提升,推动服务消费范围扩展。高素质人口在高端/复杂服务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伴随人口素质提升,经济个体通过市场购买获得自己不具备生产优势和不能生产的服务成为可能,这是人口素质与服务增长的现实关联之一。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受比较优势影响,实行“互联网+”战略的企业,常常利用“市场”而非通过自行摸索,来满足其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服务需求。

2. 通过自给自足的机会成本效应对实际服务业比重产生影响。每个人时间禀赋既定,增加自给自足生产时间,就要牺牲市场生产时间。因自给自足生产而牺牲的用于市场生产的时间,乘以市场小时工资,即是自给自足生产的机会成本。对于特定服务,当自给自足生产机会成本高于其所带来的满足感时,人们会放弃服务的自给自足,转向服务的市场消费。由于高素质人口和低素质人口的家庭自给自足生产效率差异小,劳动力市场小时工资差异大,高素质人口进行家庭自给自足生产所产生的机会成本要远远高于低素质人口。也即,对于任意特定服务的家庭生产,高素质人口和低素质人口所获得的满足感几乎无差异,但前者比后者的机会成本更高。结果是,相对于低素质人口,高素质人口将更多种类的服务获取方式由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转为市场购买。人口素质越高,其市场消费服务越多。

3. 通过对服务产品的相对偏好效应对实际服务业比重产生影响。与低素质人口相比,高素质人口对服务产品有着更高的生产和消费偏好。首先在消费方面,高素质人口的平均恩格尔系数更低,服务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更高。这不仅与高素质人口的高收入水平有关,也与由文化素养和学习能力等因素导致不同素质人口的认知差异有莫大关系。其次在生产方面,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高素质人口比低素质人口更愿意从事服务产品的市场生产。原因在于,高素质人口从市场服务生产获得的满足感与从相同时间的自给自足生产服务获得的满足感间差异更大。这与自我实现的成就感、社会认同的喜悦感等心理作用有很大关系。总之,随着整体人口素质提高,社会对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倾向越来越大于对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实际服务业比重增长。

4. 通过技能溢价的相对价格效应对服务业名义比重产生影响。市场经济中,企业依据生产效率确定工资水平,不同素质人口生产效率不同,工资不同。如果高素质人口与低素质人口工资之比等于两者效率之比,这时没有发生技能溢价;但如果企业的工资制度使得高素质人口与低素质人口工资之比高于两者效率之比,技能溢价形成。在技能溢价条件下,企业的工资安排将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口加

^①也就是说,高素质人口和低素质人口在低端产品的生产上,效率差异很小;但在高端产品的生产上,效率差异很大;产品复杂度越高,效率差异越大。

入该产品的生产,市场中消费的较为复杂的产品也将更多地由高素质人口来提供。但服务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生产属性,一个重要的体现是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具有时空一致性和异质性,这使得生产服务产品比生产物质产品更难用机器替代。特别对高复杂度的物质产品和高复杂度的服务产品而言,情况尤甚。比如,对于高精度、高难度的机器加工,可以利用高端数控机床的精准运行来取代大国工匠的精细制作,但对于壮阔雄浑、天人合一的交响乐,即便是时下最好的人工智能设备也难以取代音乐大师的倾心演奏。其结果是,随着技能溢价提升,市场中的服务产品整体上具有更高的相对价格,从而提升以现值衡量的服务业份额。

三、人口素质影响服务业增长的“外部加速器”

人口素质除了其自身可以影响服务业增长之外,收入提升和技术进步等其它外在力量也可以以人口素质为“传导中介”促进服务业加速增长。这种“传导中介”发挥作用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调节高素质人口比重加速服务业增长,另一种是通过调节高素质人口与低素质人口的相对价格(即技能溢价)加速服务业增长。前者为人口素质的“数量中介效应”,后者为人口素质的“价格中介效应”。在具体传导路径上,技术进步和收入增长可以通过推动消费升级、改变服务生产结构、提高技能溢价和改变人口构成等方式,对高素质人口的比较优势效应、机会成本效应、心理偏好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从影响深度上进行强化、从影响范围上进行扩展。总之,存在收入提升和技术进步等外生变量在人口素质影响服务业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外部加速器”作用。

(一)技术进步借助人口素质影响服务业比重增长

以近年来中国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变动情况来反映技术进步。根据深圳德高行知识产权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技术进步指数(TPI)简介》,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开始下降,直至2011年前后这种趋势才得以扭转,2012—2017年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呈现出了小幅加速增长态势^①。技术进步发挥“外部加速器”作用的方式通常有两类:一类通过消费升级强化比较优势效应;一类通过改变服务生产结构强化相对价格效应。

1. 技术进步通过消费升级强化比较优势效应。按照复杂度由低向高顺序将生活中能够实现的服务需求依次排列。消费升级意味着,较之以前人们能够满足的服务,升级后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复杂度进一步提升。外生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率,推动了消费升级,使人们能够满足的服务范围得以扩展。比如,以所谓的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为代表的新兴服务种类,它们在市场的普及与中国近年来的科技进步有莫大关系。对于这些新兴服务种类,普通大众受技能水平等比较优势限制,很难自行提供,需要借助市场由专业化机构组织(高素质人口的集合)提供。此外,随着产品复杂度提升,高素质人口生产率下降速度慢于低素质人口生产率下降速度。也就是说,高素质人口在生产率上的比较优势将随着服务产品复杂度的提升而增强。因此,随着技术更迭速度加快,社会能够生产的服务复杂度将快速提升,高素质人口在生产率上的比较优势将越发明显,这将不断强化服务的市场消费、弱化服务的家庭生产,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

2. 技术进步通过改变服务生产结构强化相对价格效应。通常,服务生产结构随外生技术进步变化,人们在市场中消费的服务,由高素质人口生产的数量将增加,由低素质人口生产的数量将减少。这种改变意味着技术进步使许多原来由低素质人口生产的市场服务转变为由高素质人口生产。一方面,高素质人口可以比低素质人口更有效率地生产这些服务;另一方面,高素质人口的小时工资高于低素质人

^①参见:http://www.sohu.com/a/211585308_572528。

口。如果技能溢价伴随技术进步快速上升,由低素质人口生产转为高素质人口生产的服务总价值将会提升。最终会通过“工资—价格”、甚至“工资—价格螺旋”传导机制对以现值衡量的名义服务业份额产生影响。^①可见,技术进步强化了由高素质人口技能溢价上升引起的相对价格效应。

(二)收入水平变化借助人口素质影响服务业比重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560美元,正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②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依旧保持高速增长。2011—2017年,中国人均GDP从5577美元递增至9281美元,年均增速达8.86%。虽然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人均GDP大于3000美元就应该是服务消费开始加速增长的重要转折点^{[18]57},然而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差距降低了整体的边际服务消费倾向,中国服务消费的黄金时期直到近几年才到来。收入增长发挥“外部加速器”作用方式至少有三类:一是收入增长通过消费升级强化比较优势效应;二是收入增长通过提高技能溢价强化机会成本效应;三是收入增长通过改变人口构成扩大心理偏好效应。

1. 收入增长通过消费升级强化比较优势效应。用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来反映近年来的消费升级趋势。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随时间变动如下:2006—2008年,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2009—2011年,恩格尔系数基本保持平稳;2011年以后,恩格尔系数呈快速下降趋势,消费升级趋势明显;至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用于基本物质需求的消费支出比重仅为28.6%,农村居民家庭也仅有31.1%,服务消费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快速上升,而且人们的消费需求逐步向更为复杂、更为高端的服务产品扩展。由于高素质人口在更为复杂的服务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导致这些新增的、更为复杂的服务需求将由高素质人口在市场中提供。而且伴随消费升级不断推进,新增服务需求的复杂度将不断上升,高素质人口在复杂服务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将不断得到强化。这里的收入提升通过消费升级强化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与前文有关技术进步通过消费升级来强化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如出一辙。但与技术进步使个人能够实现的服务需求种类和自给自足的服务需求种类可能均得以扩展不同,收入提升在扩大个人能够实现的服务需求范围同时,通常会缩小个人自给自足的服务需求种类。因而从短期看,收入提升通过消费升级对比较优势效应的强化在作用效果上比技术进步更明显。

2. 收入增长通过提高技能溢价强化机会成本效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将向复杂度更高的服务种类扩展。由于受比较优势的影响,高复杂度的服务往往要由高素质人口在市场中生产,所以随着人们能够实现的消费需求不断向更为复杂、更为高级的服务产品扩展,整个市场对高素质人口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短期内,高素质人口供给相对不变,对高素质人口需求的增加将提升高素质人口相对于低素质人口的工资水平,使技能溢价进一步提升。中国技能溢价水平自2011年以来的快速提升,印证了这一点。技能溢价的上升将对个人产生两种效应: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机会成本效应)。纯粹的收入效应将同时提高服务产品的市场消费和作为家庭服务生产中间投入的物质产品消费,因此不会影响服务产品和物质产品在市场消费中的相对份额。但较高的技能溢价则会产生明显的替代效应。随着技能溢价不断上升,高素质人口进行家庭生产的相对成本将大大提高。高素质人口考虑到家庭生产产生较高的机会成本,将减少服务的自给自足(同时减少了对家庭生产中作为中间投入的物质产品的消费),而在市场中消费更多的服务,促进了服务业增长。

3. 收入增长通过改变人口构成扩大心理偏好效应。由上文,人均收入水平提升会增加对高素质人

^①“工资—价格螺旋”描述了如下经济现象:工资的增加引起产品价格的提高,价格的提高又引起工资的增加,最终使工资的增加和产品价格的提高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变动轨迹。

^②按世界银行2015年对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划分标准依次为“人均收入低于1045美元”、“人均收入位于1045—4125美元之间”、“人均收入位于4126—12735美元之间”和“人均收入高于12736美元”。

口的需求。对高素质人口需求的增长,不仅会提高技能溢价,也将增加高素质人口数量,其来源主要有二:一是低素质人口在技能溢价的激励下,通过学习成为高素质人口;二是社会新增高素质人口,如刚毕业的大学生。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的比重在2011年达到10.06%的历史高位以后,依旧持续上升,2015年一度达到13.33%^①。由于高素质人口的服务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要高于低素质人口,且高素质人口比低素质人口更愿意从事服务产品的市场生产。因此,伴随收入增长使高素质人口比重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生产的服务数量将不断增加。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考察了中国人口素质、技能溢价与服务业增长的统计表现和现实关联,发现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于近年来的快速增长,是与人口素质快速提升和技能溢价不断上涨同时发生的,而且相同时段内三者增长趋势上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人口素质与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现实关联,既体现在人口素质对服务业增长直接影响上,又体现在人口素质在其他诸如技术进步和收入增长等外部力量影响服务业增长时所发挥的传导中介作用上。特别是,人口素质通过四种路径影响服务业增长:第一,比较优势效应。个人消费向高素质人口具有生产率比较优势的服务种类扩展,使越来越多的服务由自给自足转为由高素质人口在市场中生产。第二,机会成本效应。生产任意特定服务品,高素质人口的机会成本更高,其服务消费更多地由自我提供转为外部购买。随着技能溢价上升和高素质人口比重增加,社会实际服务消费比重增加。第三,心理偏好效应。高素质人口对服务产品的消费偏好和生产偏好更高。人口素质的整体提升提高了社会的服务消费和生产倾向,从而促进实际服务比重增长。第四,相对价格效应。高素质人口的相对工资上升,提高了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提高了以现值衡量的名义服务比重。其中,前三种效应提高了服务业的实际份额,最后一种效应提高了服务业名义比重。

近些年,虽然我国服务业加速增长,可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看,中国的经济服务化才刚刚起步。加快服务业发展步伐、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是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调结构和稳就业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体系的关键一环。从这个意义上,本文对中国服务业加速增长成因的不同看法对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具有重要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紧抓“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人口素质红利的加速释放”等多举措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不断推进中国由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

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高素质劳动力比重,对于扩大高素质劳动力的心理偏好效应、强化高素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效应和机会成本效应具有重要作用。为此,要做好如下三点。第一,正确认识劳动力素质的内涵和获取方式。劳动力素质不仅包括劳动者的物质生产能力,还包括劳动者的人文修养水平。后者的提高,可以提升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精神层次,从而强化整个社会对服务产品的消费倾向和生产倾向,从而提高服务业实际比重。第二,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虽然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中国高素质人口比重快速上升,但直到2016年底中国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的比重仍仅为12.94%,^②而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早在2012年就达到了40%以上^③。此外,要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因为它是技能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重要培养途径,能使大学教育与工作技能紧密衔接。第三,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服务业加速发展。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人力资本要素在服务业发展中

^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按教育程度分中国6岁及以上人口构成”计算。

^③数据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2012年教育展望》。

的关键作用。为此,要深化对资本概念的认识,把人力资本概念引入产业发展政策,允许对使用人力资本较多的服务业实行适度的人力资本加速折旧政策,以促进其加速收回人力资本投资。

参考文献:

- [1]蔡昉.人口红利消失之后[J].西部论丛,2010,(12):17-19.
- [2]BAUMOL W 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the Urban Cris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415-426.
- [3]肖文,樊文静.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基于“两波”发展模式的研究[J].经济学家,2012,(7):88-95.
- [4]张月友,刘志彪.替代弹性、劳动力流动与我国服务业“天花板效应”——基于非均衡增长模型的分析[J].财贸经济, 2012,(3):103-111.
- [5]李钢,廖建辉,向奕霓.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与路径——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过高了吗[J].中国工业经济, 2011,(10):16-26.
- [6]韩朝亮,符建华.中国服务业增长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再检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76-88.
- [7]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存在“成本病”问题吗[J].财贸经济,2008,(12):109-115+141.
- [8]张月友,董启昌,倪敏.服务业发展与“结构性减速”辨析——兼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J].经济动态,2018,(2):23-35.
- [9]庞瑞芝,邓忠奇.服务业生产率真的低吗?[J].经济研究,2014,(12):86-99.
- [10]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增长[J].经济研究,2017,(3):4-17.
- [11]张月友,董启昌,倪敏.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了吗[J].经济学家,2017,(5):44-49.
- [12]张月友,刘志彪.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与我国服务业发展[J].财经科学,2012,(10):92-99.
- [13]张月友.中国的“产业互促悖论”——基于国内关联与总关联分离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46-58.
- [14]姜雪.中国技能溢价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15.
- [15]宋冬林,王林辉,董直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存在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0,(5):68-81.
- [16]陆雪琴,文雁兵.偏向型技术进步、技能结构与溢价逆转——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13,(10):18-30.
- [17]BUERA F J, KABOSKI J P.The Rise of the Service Econom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6):2540-2569.
- [18]张颖熙,夏杰长.服务消费结构升级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重庆社会科学,2011,(11):54-64.

(收稿日期:2019—10—08 责任编辑:朱文佩)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Quality on the Accelerated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y

Zhang Yue-You, Dong Qi-Chang, Fang Jin, Zong We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quality on service industry growth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Studies with China as the background show that 2011 was the time turning point for the accelerated growth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e in per capita income levels, high-quality population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celerated growth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irect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quality on service industry growth can be decomposed into four typ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effect", "opportunity cost effect", "psychological preference effect" and "relative price effect" of high-quality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classifying China's development stage. It ha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major service country to a strong service country after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Key Words: Lewis Turning Point; Population Quality; Skill Premium; Economic Service